

清白的终结

简·弗拉克斯

朱荣杰译

虽然我觉得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还十分模糊，无法用任何文字来表达，但我又一次禁不住钦佩那种如梦游者般精确地万事契合的方式：绝大多数人对舒适生活的渴望，对站在高高讲台上的演讲者或穿白大褂的人的相信，对和谐的热衷，对矛盾的害怕，这一切似乎都与极少数人的傲慢和对权力的饥渴，对利益的追求，以及肆无忌惮的好奇心和自我沉醉相符合。所以还有什么不能加在这个等式上的呢？

—— 克里斯塔·吴尔芙《意外事件：一天的新闻》

故事的一部分

1990 年春季，我应邀与一群女学者探讨我的一篇文章，也就是本文的前身，与会者都是在一项著名而且成功的妇女研究项目中任教的女性。我刚刚在同一所大学的另一个会议上开了两天会，我是惟一的女性代表。我当时期望着会有一个更友好与更具创造性的交流机会。相反，我一进入房间，就非常惊讶地感觉到一下子出现的那种紧张与敌对气氛。在我的记忆中，上一次经历这样的来自一群预期盟友的敌对是在 1967 年 当时在民权运动中爆发了有关黑人权利与白人作用的矛盾。感情的强度与一种个人的真实、历史、身份和地位都岌岌可危的感觉使我回想起那些往昔的同样痛苦的遭遇。其他与会者也评论了这种紧张气氛，但无人能对此作出解释亦或改变它。

与会者重复了一些女权主义者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许多主张。¹有人对我说，“你不可能同时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是非政治甚至是反政治者。他们是相对论者；假如我们把他们当回事，任何政治立场都将是不可能维持或是正当的。女权主义者一定要提出一种依据事实的概念，并能使之站得住脚，这样就可以在彼此相争的想法中裁定矛盾，还可以使一些女权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的主张合法化。因为后现代主

义者认为没有真理，那么矛盾只能由权力（统治）的原始运作来解决。后现代主义者对于主观的解构，否定或者摧毁了世界上存在的主观能动性的可能。离开一个对历史和性属具有可靠的先验感觉的统一主体，就没有女权主义意识，因此女权主义政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意义是多元的，而且是不确定的，那么，如果你能够清楚地和可理解地写作，你就不可能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故意模糊地写作，他们圈子之外的人是无法理解他们的。一个人必须在完全接受和完全拒绝他们的立场之间作出选择。接受就必须承受放弃女权运动或者彻底消除其自治与力量，使之协从于具有破坏性的、冷淡的、男性主导的哲学。

在这场特别的遭遇中，这些主张和明显的情绪投资都没有得到阐明。但这场经历确实使女权主义在对后现代主义争论中的一些危如累卵的问题凸显出来：知识、权力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哪种主观性能够要求并支持女权主义政治？女权主义理论化过程与女权主义政治实践之间，有哪些现实的或是潜在的关系？女权主义未来观的现实化有赖于产生更多的女权主义知识还是产生有关知识的理论（在什么意义上是这样）？相对于她们彼此之间，相对于其他女性和各种各样的权力，女权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大学任教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是什么？是什么构成了女权主义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是什么动机和欲望（包括无意识的）驱使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

们理论化的本质和地位做出如此之主张？如果与非女权主义思维模式绝断，女权主义理论化（或者妇女研究项目）能得到最好的发展吗？女权主义者是否应该努力创造像马克思主义所断言的那种广袤的、并且是自足的、新的重大理论？

清白之梦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威胁到某些女权主义者，是因为它激进地改变了进行此类问题争辩通常所使用的背景假定和语境。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自从 60 年代以来，西方白人女权主义政治深深地植根于并且依赖于有关权利、个人主义和平等的启蒙话语，但女权主义者们从这些话语中继承下来的认识论遗产，直到最近才受到怀疑。²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同心理分析的某些方面结合起来时，正如它对其他许多西方哲学的所为一样，必然使女权主义理论化失去稳定的（文字的和比喻的）基础。假如人们认真对待它的某些主要看法，即使同时反对和抵制其他观点，后现代主义也必然会导致深刻的不安或者身份威胁，特别是在西方白人知识分子当中，因为他们的意识和立场就在它所批评分析的基本主体之中。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白人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构成很多方面的威胁，但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后现代主义对存在某种形式的清白知识有待我们掌握的信

念（或希望）提出疑问。这种希望在整个西方哲学（包括很多女权主义理论）史中不断重现。很多女权主义者已经对这些梦想的内容提出批评，但是还有许多人难以丢弃它们。³

至于清白的知识，我指的是某种真理的发现，它能够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去做，才能够有益于或者是为了（至少是最终的）所有人的利益。那些以这样的真理为基础或指导而行事的人们也会使他们的清白得以保证。他们只会对他人行善，而不会去伤害他人。他们做某些事情的信徒，那些事情高于或者超越（或者多于）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欲望和他们特定的历史或社会地位的影响。如此真理的发现将会使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解决核心哲学和社会问题：如何使知识和权力（或理论与实践）保持一致。⁴

启蒙运动和西方现代性的一个允诺，就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以理性建立权威并运用权威来解决。⁵ 理性不但表现真理，而且包含真理。它还以两种额外的方式共享普遍性：它在每个主体中同等地发挥作用，它能够掌握法则，这些法则客观地真实；也就是说，对于每个人都是可知的和具有约束力的。这一套信仰产生了启蒙运动思维中的一种基本的二律悖反——迷信 / 统治对知识 / 自由（解放）

知识在这个方案中具有奇特的两面性。它可以同时是中立的和对社会有益的（有力的）。利用真理性知识来

为合法权力服务将确保自由与进步，是启蒙运动的希望所在。这种情况只有在知识以普遍接受的理性为基础并以其为保证时才会发生，而不是特别的“利益”。更多知识积累（更多真理的获得）的同时，结果是更高的客观性（中立性）与进步。就权力 / 统治是以扩展的知识为基础这一点而言，它也是具有进步性的，也就是说，它变得更为理性并且扩展了它的主体的自由和自我实现，这些主体自然地使它们的理智服从于它的（或它们的）法律。权力可以是清白地或纯粹地有助于解放的；“理性的”权力可以有别于并且不会产生新的统治形式。这样的权力在运作与结果上可以是中立的（它不会伤害任何人）和透明的。因此，它决不是真正的权力，特别是当它用 / 通过法律这样中立的媒介来运作时。

明显地，这个梦想停留在一些祈望上。我们必须假定社会的和物质的世界是由惟一的、仁慈的和绝不矛盾的一套法律来支配与掌管。使我们的行为顺从于非单一的或恶意的法律会产生它们自己无法用法律来解决的矛盾与分歧。不存在一个中立的“决定程序”，能够在决定矛盾怎样解决的同时，不厚此薄彼，给一个立场而不是另一个以特权地位。离开了使所有人受益的、普遍的、中立的保护性基础，权力将失去它的清白。法令将不得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加于人而不是被人发掘。知识将被视为对某些（人或结果）很有用处，而对另一些人则是压迫性的。由知识产生的行动将产生不可预测的差

别性的结果。

我们同时必须假定在所有人类范围之内还存在另一同类形式的理性，这种理性本身不受其他（异质）的诸如欲望或历史经验一类的因素的决定或影响。人类必须具有通向操作他们理智的“特权通道”，并且能够理解它的内在局限性（假如有的话）。否则，理性这个立法者自身就会被特性与暂时性所污损。这种理性不可能是一个可靠的源泉，使我们可以获得关于我们自身、关于客观真理的发现，或关于一种个体应该遵从的权威的知识。

自由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和经验主义社会科学，是女权主义者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而企图改编的三种话语，它们表达了某种形式的启蒙运动的梦想。每种理论的一致性与道德力量都依赖于它以这样一些启蒙运动的信仰为基础。从约翰·洛克到约翰·罗尔斯的自由政治理论家，都力图通过倾听和记录理性的声音，将合法权威与统治分离开来。他们宣称，他们正在用理性自己的语言清晰地说出一套规矩或信仰。为了能够听到理性的语言，必须经历净化仪式（设想“自然状态”或揭去人自己周围的“无知的面纱”），⁶以便将仅仅是偶然的或历史的东西去除。真正属于理性的，并因此约束所有事物的权利或规则，会重现它们自己。国家与主体服从这些（中立的）法则，就会保证自身的理性、正义和自由。

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梦想有自己的解说。他们的客观基础倾向于历史而非理性，尽管在他们的论述中，历

史本身最终也是理性的、有目标的、统一的、由法律掌管的和具有进步性的。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历史事件不会随意发生；它们通过潜在的、有意义的和可用理智 / 科学来理解的理性的结构相互关联。历史的前提目标是人类的完善（特别是通过劳动）并完全实现他们的能力和计划。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他们的发言人（党，劳动阶级，为其所用的知识分子）与历史有一种特殊的关系。⁷ 既然历史与理性一样，有一种基本是目的论的和同质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它的“终结”。然后，所有不可解决的矛盾或者冲突的根源都将消失，权威将采取管理所有事物的形式而不是对人的统治。权力将是清白的、人类的行为，与我们最高级的最具解放性的潜力相一致。⁸

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同样继承、反映启蒙运动的梦想，并是它的受益者。这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由科学或者至少由对科学的特别理解来协调。正如启蒙运动哲学家将理性视为惟一通向真理的道路和真理的声音，他们也将科学视为知识的完美形态。现代哲学，如康德所例证，以解释科学知识何以成为可能的任务为开端，即，物理学如何可以发展如此精确可靠的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⁹ 直到最近，大多有影响的现代哲学家还不打算怀疑这个信仰：科学的确会产生这样的知识。

社会科学家也很少对科学与真实的关系发出疑问。他们关注的是这样的知识是否能用于社会世界，如果可能，什么方法最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¹⁰ 他们吸收了启蒙

运动的信仰，认为科学是知识的完美形态、正确运用理智的范本和所有真理主张的方法范例。他们接受了这样一种由库恩之前（pre-Kuhnian）的哲学家们所创造的关于科学的说法，即理性在科学中的形态是“发现的逻辑”。这种逻辑是普遍的且对所有科学实践者具有约束力。它既不影响主体／调查者，也不影响客体／数据材料，因此它是中立的。科学的“成功”（发现）归因于实践者对此种逻辑的执着。这种“科学方法”能使所有运用它的人发现（不是构建）关于其客体的真理——独立存在于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模式之外的真实的碎块。¹¹

一种科学的基础可以保持社会科学家的清白。由合理的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必定反映真实（真实也是理性的，仁慈的，真的）。因此，社会科学所产生的知识自然而然（没有冲突）地是中立的、有用的和解放性的。它可能处于有益的一侧，没有不合理的代价。社会科学家的知识和权力可以不含对任何人的偏见、歧视或者是不良的影响。它的清白由其所依据的普遍真理／法则来保证。

这些主张的似真性、一致性甚至可理解性明显依赖于一套没有宣布的背景假定。这些假定包括这样一种信念：真理和偏见是清晰可辨、分成两类的范畴；而且有一种现成的中立语言来报告我们的发现；“发现的逻辑”是独立于它的主体（使用者）和研究的客体之外的活动，既不会扭曲主体也不会扭曲客体；“科学的”进程假如有“自我纠错”和“自我控制”，它会逐渐地但必然地消除

任何偏见与谬误；社会世界是稳定的、同一的和依法构建的；这些法则是善意的并且相互不冲突，也就是说，为全体人的均等利益而服务。

于是，我们可以假定，在发现和管理社会法则之间没有根本的分隔。科学的真实有一种独立于认知者之外的不变且不可改变的存在性；它并不仅仅是人类在科学实践的过程中所创造或转变的东西。既然科学家以真实的声音发表言论并表现真实，“基本的”和“应用的”社会科学就只不过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将无知与偏见移开，以理性的中立法则代替。基于科学/专门知识的行为也就因此是权力的清白形态，此种权力的行使和后果就像科学事业一样具有透明性和普遍的可接受性。专门法则不会在它的操作中产生特权或统治，而只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共同利益。¹²

20 世纪的梦魇：中心不再具有凝聚力

现代西方的自我肯定感已经被政治的和知识的事件所颠覆。启蒙运动所有形式的元叙述的基本概念（理性、历史、科学、自我、知识、权力、性别和固有的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含义——甚或存在——都已日益受到侵蚀性的攻击。对西方政治经济霸权和政治与文化殖民主义的挑战，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世界各地的妇女运动，以及反种族斗争等，都已经使事物的秩序大为

混乱。

西方知识分子的认识论的安全感也已经被来自内部的不同声音所破坏。启蒙运动元叙述的构成性概念的“基本可论争性”（和“过于人性的”偶然性）已经被揭露出来。这造成了清白的危机，因为这些概念紧接着就变成了纯粹的人造产品，它们是人类所创造的，我们对其影响和效果要负全责。假如下面没有可靠的基础，上面没有本体论与先验论的保证，人类的生活就很困难。

尽管还带有矛盾态度和与旧体制的部分同谋，心理分析学者、后现代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都对颠覆西方思想的基础做出了贡献。心理分析学者对理性自治、意识与思维的对等、自我的统一与稳定提出了疑问。他们强调充满欲望和幻想的内心世界的存在性与部分自治性。这个内心世界对于诸如思想等人类主观性的其他方面具有无意识和无法控制的影响。后现代主义者所编写的有关知识、权力、历史和主观性之间关系的叙述，更为复杂，希望也更小。¹³女权主义理论家提出，有关知识的思想依赖于具体的，包括性别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存在，而这些社会关系又使之变得可信。¹⁴哲学家们所讲述的认识论故事倾向于根本上是关于老一套的白人的、西方的、男性自我的经历、问题和压抑行为。

后现代主义者相信，在继续构建西方文化的启蒙运动的元叙述内，哲学占据了构成性的和立法性的位置。因此，解构哲学是一项政治责任，也是（至少作为哲学

家)对当代西方文化最突出、最具破坏性的贡献。西方哲学仍旧生存在“存在的形而上学”的魔咒之下。¹⁵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把建构一个哲学系统视为己任,在这个系统中一些真实将被也能被再现成思想。这种真实是外部的或普遍的主体或物质,“在外面”独立于认知者而存在。哲学家的欲望是“映射”、登录、模仿或者再现真实。真理被理解为与其相符。

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个对真实的探寻掩盖了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的欲望:就是永久地掌管世界,通过把世界封闭在一个虚幻的但是绝对的系统里,他们相信这个系统能够再现或者符合一个超越历史、个性和变化的一元存在。为了掩饰他的理想化欲望,哲学家必须宣称他的知识不是某一套特定历史和话语实践的产物、制品或结果。它只能是真实本身在我们的思想中的自我表达。

哲学家同样把其欲望的另一个方面模糊化了:要求获得一种通往真理或真实的特殊关系或途径。对我们来说,真实的存在要靠他——他清晰的意识、他纯洁的意图。只有哲学家才具有理性的才能、对智慧的热爱(智慧偏爱)、对方法的掌握或建构足以通向真实的逻辑。正如真实是真理的基础,同样作为真实的特殊代表和真理的质询者,哲学家也必然在所有“肯定的知识”中发挥“基本的”作用。因此,现代哲学中认识论的重要性也是如此。认识论是净化、澄清或区分哲学家意识的手段,不

仅对哲学家本人是如此，对其他哲学家也是如此，而最终对全人类也是如此。

后现代主义在很多方面向“存在的形而上学”和西方哲学家的自我理解发起进攻。他们质疑思维、真理、语言的哲学，以及隐含在任何超验的或基本的主张之下并作为其基础的真实。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超验思维；相反，我们所谓思维和理性，只能是话语的一种结果。精神生活没有直接的或不容置疑的特征。感觉资料、概念、意图和感知都已被建构。这样的经验只能产生于并且反映出各种各样由话语和社会决定的实践。“思维”和“事物本身”之间的关系问题变得无限复杂。一个人甚至不能假定思维具有某些普遍的、超验的、演绎的范畴或概念，它们总是按照同样的、即使是不可知的方式形成经验。相反，我们用以或者通过其构建经验的范畴或概念，本身就是历史的与文化的变量。“思维”和历史一样都不再具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同一性、合法性与内在一致性。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真理是话语的结果。每种话语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规则或程序，它们支配着有意义的或真实的陈述的产生。每一种话语或者“话语的构成”同时既授权又限制。一种话语的规则可以使我们创造出某些陈述和真理主张，但是同样的规则又强迫我们停留在系统之内，并且只创造那些符合这些规则的陈述。就整体而言，一种话语不可能是真或者假，因为真理总是与

语境关联，而且依赖于规则。话语是地域性的，异质的，经常是不可比较的。没有任何独立于话语之外或超验的规则可以支配所有的话语，或在它们之间的选择。真理主张原则上是话语之间或之外的“不可判定性”。这并不意味着真理不存在，而是说真理依赖于话语。真理主张可以由那些接受了某一种话语规则的人，或者那些希望将几种话语沟通的人来制定。不管怎样，没有现成的、我们可以依赖的王牌去解决所有争执。不是客观真理的强制权力，而是对于规则的事先一致，使解决矛盾成为可能。

后现代主义不是相对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因为相对主义只在与它的两元对立面——普遍主义组成一对时才具有意义。相对主义者假定绝对标准的缺失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一种事物能够用以度量所有的主张，所以“每一件事都是相对的”。假如缺少对绝对普遍标准的追求，“相对主义”就会失去它的内在含义和力量。相反，我们将不得不更加注意使矛盾的主张能够被解决的情境，以及那些只有政治行为——包括运用强制力量——就足够了的情境。不追踪权力关系的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知识，这些权力关系同时授权并限制了话语的各种可能性。甚至连一致也不是完全清白的，因为在任何一套获得并保持约束效力的规则的历史中，都可以发现强力的痕迹。虽然不需要强力或统治来解决所有的纷争，但话语并不会独自解决不可调解的分歧。

后现代主义者与所有将语言描述成一种透明的、被动的或者中立的媒介的概念进行论争。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被带进一系列正在进行的语言游戏之中，为了能够被人理解和理解别人，我们必须学习掌握它们。因为人类是“讲话的动物”，我们的人格（至少部分是）由语言来构建。语言在言说我们，正如我们言说语言一样。更进一步，我们的经验的意义和我们对经验的理解不可能独立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经验或思想是用语言并通过语言来掌握和表达的。思想依靠语言，并且由语言（对自己和别人）来清晰表达，在此程度上思想和“思维”本身将被社会地和历史地构建。不存在一种非历史的或超验的立场，根据它真实可以直接地、无需建构/扭曲地在思想中或由思想来理解或叙述。

另外，也不存在稳定的、不变的和一元的真实，用以检测我们思想。通过将人类和物质世界的变化和异态归纳为二元对立和所谓的自然对立，西方哲学家创造出统一与稳定的虚构表象。把混乱置于诸如文化/自然、男性/女性等二元组合的层面上，秩序被勉强实行并维持。作为对立或通过对立建构的这种范畴，表达和揭示了哲学家控制与统治的欲望。一旦这些对立被视为虚构的、不对称的，是哲学家故事中的可能情境，那么，隐含于形而上学存在的各种变体之下的前提就昭然若揭：一个他者，一个不同于定义的人就是劣等的，是没有独立性格的，或是不配拥有自我的人；比如，在从亚里士多德到

弗洛伊德的话语中，“妇女”都被定义为不完善的人。一对组合中那个优等者保持着他的清白。不同于那个劣等者，他保证了他拥有独立和自然的优势；他处于二元组合，却不真正属于这一组合。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主人或丈夫，他的一面是主动的实体，在内部起着决定和生成作用，但从不受其匹配物的影响。在他的内部没有混乱，因此在这样的实体之内，也没有混乱，但是可以有混乱的客体需要他进行掌管。在启蒙运动自我理解中，这个观点是一个“乐观的”、“仁慈的”和“进步的”观点；最终所有不同/混乱都将被带进那个一元的仁慈统治之中。

后现代主义者用怀疑的目光看待所有这些对统一的渴望。统一是统治、压迫的结果和修辞战略的暂时成功。所有的知识建构都是虚构的和非再现的。作为人类思维的产物，知识与真理和客观真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哲学家们创造了有关这些概念和有关它们自身活动的叙述。这些叙述不比其他叙述更真、更基本，或者更能裁判真理。没有办法来检验一个叙述是否比另一个更接近真理，因为，没有一个超验的观点或思维不陷于它自己语言和叙述的泥沼。

哲学家们和其他知识构建者应该寻求生成一种无限的意义“散播”。他们应该发誓放弃任何构建封闭系统的企图，在这个系统中，他者和“多余者”被“推到边缘”，然后又为了统一与和谐的大局而被迫消失。与其说

他们的任务是（重新）构建总体性或宏大理论，还不如说是破坏与颠覆总体性或宏大理论。后现代主义者必须在自己的话语中坚定地给自己定位。妄自尊大的、非人性的、笛卡尔式的自我主义将被解构，它的欲望将在语言内获得释放，并作为语言来自由表现。“无出处的观点”被公认的多种多样的局部和碎片所替代。¹⁶

女权主义理论家也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与知识中的许多理解提出很多深刻的但还没有受到足够对抗的挑战。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揭示性属关系并将其问题化。性属已经被重构为非常易变的而且是历史偶然的一套人类实践。性属关系涉及人类经验的很多方面，从“内在自我”和家庭生活的形成，一直到所谓的国家、经济乃至知识生产的公共世界。性属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虽然性属与体现的关系在女权主义理论家中是一个有趣且有争议的问题，但它决不是一系列解剖学与生物学的象征。我们甚至不能宣称，性属是一个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的普遍的或单一的关系，因为它是女权主义理论家已经构建用以分析我们文化和经验中某些关系的一个范畴。因此，这个概念必须反映我们的问题、欲望和需求。

女权主义者已经成功地在知识生产领域，对男性统治的生成性权力进行了系谱调查。我们已经开始追踪性属知识的抑制及其在构建个人经验、社会关系和知识自身中所起的基本作用。我们也已经开始探索由女性和男性经验的某些因素造成的知识抑制和贬值。某些经验和